第 50 卷 第 4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0, No. 4
2013 年 7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13

英帝国话语霸权的兴起及其消解

洪　霞

(南京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3)

摘　要: 近代以来,英帝国能取得世界性优势,是与其扩张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话语霸权互为支撑的,这也是帝国合法性的根本。话语霸权通过无形的影响逐渐渗透到英国和殖民地双方的意识形态中,从而取得来自双方的积极赞同。与此同时,帝国话语霸权又是个英国与殖民地的相互塑造、共同成长的过程,从而为消解帝国影响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英帝国; 话语霸权; 殖民地

中图分类号:K 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4-0140-09

意大利学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指出,在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中,观念、机制和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积极的赞同(consent)来实现的。这就是说,某些文化形式有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一样,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就是文化霸权。

葛兰西认为,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文化国家、伦理国家,"事实上,必须把国家看作是教育者,因为国家的目标就是建立新型的文明或达到新的文明水平"①。换言之,国家的实质就是"独裁"加"霸权"。② 由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因此"国家,确切地说,本身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融贯一致的、同质的世界观"③。国家在实施统治的时候,主要有两种方式,除了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关以暴力的形式来推行意识形态之外,"各级学校和教会,在每个国家中都雇用大量人员,都是最大的文化组织。然后是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私人教育机构,它们或者是国家体系的补充,或者是像群众大学那样的机构。在其他职业的专门活动中也包括较大部分文化活动。例如,医生、军官、法律职业"④。这两种方式并不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只有这两者相互默契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使得国家得以稳固。"系统完整地阐述指令,设置完善的执行和核实机构,充分酝酿群众'自发'的认可,按照这些指令'生活',调整各自的习惯、意志以及服从这些命令及其目标的信念"⑤,这就是西方社会中,文化霸权得以建构的缘由和机制。

而在近代的殖民体系中,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从而形成一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的共识。⑥ 拥有最大殖民帝国的英国,这样的话语霸权不仅是英国形塑世界现代性面貌的基础,也对维系英国全球殖民霸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支撑作用。一个帝国能够

收稿日期:2013-01-10

作者简介:洪霞,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帝国的形成、发展及其在 20 世纪的解体"(项目批准号:11ASS001)阶段性成果。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2 页。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 195 页。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 254 页。

④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 253 页。

⑤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 221 页。

⑥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0 页。

持久,单单依靠其政治、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要有来自英国国内和殖民地双方对英国价值观的认同——这是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来源。本文正是从文化霸权的视角,来解读英帝国话语霸权的内在逻辑、推行机制及其与殖民地的互动关系。

一、英国话语霸权的二元逻辑

在享誉世界的《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指出,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① 换言之,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是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漫长的历史时段内,有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②

殖民地是一个被一分为二的世界,被殖民者不仅在生理上和地域上,以及权利和特权上同欧洲人隔离开,在思想和价值观上也同欧洲人隔离开来。在帝国的想象中,被殖民者被塑造成处在遥不可及的地方的他者,被划分在欧洲一切文明价值的界定之外,他们被视为不能与之讲道理、不会自我控制、不能自我表述、不尊重生命的价值、只理解暴力的人群。③ 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人对被殖民者的表述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把东方同质化,整个东方被描绘成哪儿都差不多;二是把东方原质化,东方和东方特性被描绘成永世不变的同一性。④ 简言之,殖民主义制造出各种他者形象,并在一个复杂、辩证的结构中操控它们的流动,由非欧洲的他者形象反过来构建起欧洲的同一性。

欧洲同一性的塑造方式,遵循的是一种文明/野蛮的简单二分法,这当中蕴含着一种二元排斥的逻辑。被殖民者的邪恶、野蛮和放荡反衬了欧洲人可能具备的善良、文雅、节制的品质,欧洲自我的同一性正是在这一辩证阶段中被制造出来。⑤

上述二元逻辑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阶段就已萌芽,民族国家塑造着内部的纯洁性和同一性,严格支持着边界的排斥功能,有区别地将不同的形象塑造应用于分居边界两边的主体上。⑥ 并且,在一切以民族边界作为划分依据的文化中,都有一种想握有主权、产生影响、并统治他人的愿望。萨义德指出,近代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不言自明的。这种划分始于希腊时期关于野蛮人的概念。⑦ 至18世纪晚期,殖民体系在全球逐渐建立之时,对东方的看法也逐渐建立起来,即“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⑧而到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当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拥有者时,对殖民地的看法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特征,英国在文化上对主导权的寻求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维多利亚中期,英国构建话语霸权的最核心观念是“进步”与“文明”。作为最基本的启蒙思想,这些概念体现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精神面貌上,也成为围绕着帝国机制探讨的所有论题

①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第7—8页。
②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第3—4页。
③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④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第150—151页。
⑤ 参见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第152—153页。
⑥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第140页。
⑦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页。
⑧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第3—4页。

中的基调。那一时期的英国人,相信他们在世界历史中具有独一无二性,并且意识到他们持续发展的文明状态,喜欢从生物学上和地理学上把他们自己同所有其他自然状态相比较,从而建构更多的优越性。① 这种看法导致 19 世纪下半叶英国种族主义曾盛极一时,它融入到英国的社会文化之中。不过,英国所指的"种族",更多是从文化角度定义的,种族共鸣是"基于语言、道德、知识和政治影响的"②。因此,不列颠种族实际上指的是拥有同一种文化的共同体。19 世纪末任殖民大臣的张伯伦曾说过:"命运之伟大与重要完全留给了盎格鲁—撒克森种族,因为气候和环境不能改变这个骄傲、顽强、自信和果断的种族。"③

按照这个逻辑推论,英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统治世界的神授权力,它的对手无疑就是天生低劣的民族。因此,上述看法,也导致了包括比较人类学在内的分析学科的兴起,其他社会和文化现象都按照设定的历史、考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的观点进行评定和分类。乔治·库布在其对于种族差异的研究著作中的陈述很耐人寻味:"当我们观察全球各个地区的差异时,我们不禁因居住在各地区的不同种族的人类在成就上的显著区别感到惊奇……纵观非洲历史,如果非洲还有所谓历史的话……它无时不刻不展现出一种道德和智慧的缺失……"④正如当代学者彼得·伯勒指出的,社会发展模式导致以下观念产生:自由的价值被视为社会发展趋势不可避免的产物,使得"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商业和职业阶级坚称,他们创造的社会代表了其他国家必然渴求的目标"⑤。因此,工业社会的精神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英国还有责任领导其他人类分支进入到文明状态中。

从理论发展上讲,文明/野蛮的简单二元逻辑也渗透到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构成自由帝国殖民理论中的一个悖论。一方面,自由主义强调帝国的道德基础,遵循讲求道义的传统。著名自由主义者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指出,"英国人和美国人奋斗的、进取的性格……本质上是人类普遍进步的最好希望的基础"。⑥ 1911 年,著有《自由主义》一书的思想家霍布豪斯则更为明确地说道:"一个国家要变得伟大,不仅可以通过把地图绘成红色,或者把其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可以通过作为正义的先锋、被压迫者的救星、自由的老根据地,使国家变得伟大。"⑦

与此同时,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又暴露了它的另一方面。思想家约翰·密尔明确指出:自由原则不适用于未开化民族,因为未开化民族是尚不成熟的幼童,还需要他人来监管。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约翰·密尔将英国属地分两类,"有些是由具有和统治国家同样的文明的人民组成的,能够并具备条件实行代议制政府,如在美洲和澳洲的领地。另一类,象印度那样,则和那种状态仍相距甚远。……落后的人民直接隶属于较先进的人民或者处于后者的完全的政治支配之下已经是通常的情况,并将迅速成为普遍的情况"⑧。密尔认为,专制统治有好的和野蛮的之分,好的专制统治是"自由的人民对野蛮的或半野蛮的(人民)的理想的统治"⑨。而印度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家,作

---

① G. Alex Bermner, 'Some Imperial Institute Architecture, Symbolism, and the Ideal of Empire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1887—93',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Vol. 62, No. 1 (Mar., 2003), p. 64.

② 英国首相罗斯伯里语。H. C. G. Matthew, *The Liberal Imperialists: The Ideas and Politics of a Post—Gladstonian elite*, Oxford, 1973, p. 161.

③ Paul Kennedy and Anthony Nicholl, *Nationalist and Racialis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 Before* 1914, Oxford, 1981, p. 193.

④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6 页。

⑤ G. Alex Bermner, 'Some Imperial Institute Architecture, Symbolism, and the Ideal of Empire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1887—93', p. 64.

⑥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51 页。

⑦ 伦纳德·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51—52 页。

⑧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 249 页。

⑨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 249 页。

为文明国家的英国应当对印度实行“仁慈专制”制度①,以使其走向文明和进步。至20世纪初,自由主义学者及历史学家詹姆士·布赖斯依旧认为,在印度,“没有其他任何统治形式适合一个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仇恨而分裂的种族各异、语言不同的广大人口,而且也没有一种比村委员会更大的自治政府的经验适合于她”,而只有在印度社会的分裂消失时,英国的直接统治才会趋于消亡,但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遥远的将来。②

历史的事实证明,帝国史专家马克斯·贝洛夫关于“英国不是个有帝国头脑的民族,也缺少制造它的意愿”的著名断言未必尽然③,英国虽然没有明确的帝国理论,但却是自发地按照文明/野蛮的二分法来构建帝国的文化优势。英帝国意识形态,融合了爱国主义、对殖民利益和冒险的兴奋,对君主的尊重,以其他民族为参照的自我评判方法,对尚武品质的羡慕,以及一种对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和责任的半宗教情感,并逐渐成为了英国民族性的主要成分。④ 至于文化使命观,即处于较高文明程度的英国人负有向全世界传播英国文明的天定使命,则是这种帝国意识的进一步推衍,正如张伯伦指出的:“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美德及缺点一并传播到有人居住的地区。”⑤1878年卡那封伯爵的话则更为具体,“我们的责任在于向他们传播明智的法律、优秀的政府,以及组织良好的财政,这是人类团体中美好事物的基础;我们的责任在于向他们提供一种体系,以使最谦卑的人可以与最伟大的人平等地享有不受压迫的自由。在那里,道德与宗教的光明能穿越最黑暗的居民区。这就是……帝国主义含义的真正力量”⑥。

可以说,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由不同的文化组成的世界,因此他们对东方的看法更多是为了建构西方的文化优势,是把东方作为西方文化的参照物;所谓“好的政府”是把西方原创的体系向东方社会移植,因为那是前者文化优势的一大体现。自由主义是19世纪英国的主流思想,它的这种两面性,给英国对殖民地一方面压榨、一方面发展提供了最佳的理论依据,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所在,也是英帝国话语霸权的核心。

二、英帝国的文化霸权和作用机制

帝国史专家D. K. 菲尔德豪斯指出,帝国的持久性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维持的,而且每一方都有从其自身的视角、历史感、情绪与传统出发,对它们的共同历史所做的一套解释。⑦

1848年,狄更斯在小说在《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的开头中绝非夸张地写道:“地球是专门为了董贝父子公司在上面进行交易而制造出来的;太阳与月亮是为了给他们照明的;河流与海洋是为了他们的船只在上面航行的;彩虹使他可以盼望天气晴朗;他们的公司有时顺风,有时逆风;行星与恒星沿着他们的轨道运行,以保持以他们为中心的体系不受侵犯。常见的缩写字在他眼中具有了新的意义,对他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A. D. 与Anno Domini有关,而且代表Anno Dombi父子公司。”⑧可以说,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来自英国的对帝国的极度自信支持之声不绝于耳,帝国成为英国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切与英国有意识地建构起话语霸权

① 参见洪霞:《英国视角下的对印‘仁慈专制’统治》,《学海》2010年第1期。

② Paul B. Rich, *Race and Empire in British Politics*, *Cambridge*, 1986, pp. 22—23.

③ Max Boloff, *Britain's Liberal Empire*, vol. I, London, 1989, p. 19.

④ Andrew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1999, p. 291.

⑤ E. A. Benians, Sir James Butler and C. E. Carringt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II The Empire—Commonwealth* 1870—1914, Cambridge, 1959, p. 347。

⑥ C. C. 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 1978, p. 3.

⑦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13页。

⑧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15—16页。

是分不开的。① 时任首相的罗斯伯里指出:“既然这个世界可以按照我们的模式来改造,那么关注这个世界形成英国的面貌——而非他国的面貌,这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②

在整个大英帝国范围内,霸权都是通过帝国权力的展示来实现的。除了常规性而为时短暂的军事游行和海军检阅之外,帝国的权威还通过各种建筑形式得到更持久的体现,公共建筑物成了权力的象征。以伦敦而言,从 19 世纪中期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英国人都期望建造一座足以体现出伦敦在英帝国崇高的中心地位的城市。1854 年担任工程事务部顾问的佩内松爵士,希望建造出一座足以让巴黎、罗马和威尼斯自惭形秽的帝都。“在我看来,首都是属于帝国的。……伦敦每年大概要迎来数以百万计本土之外的帝国公民和外国游人,而在帝国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它的)市容……(它)开放的空间和公共设施产生兴趣。”③从特拉华加广场到滑铁卢车站,从伦敦各广场的纪念雕像到马休·怀亚特在印度事务部堂皇的接见室,都是极盛时代英国的缩影。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和基尤花园,则是帝国实力的另一种见证。它们都反映了英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吞并,也反映了英国对国家文化建设和民族心理塑造的重视与设计。身处这些艺术财富和科学的殿堂,改变着人们的感受和体验,从而改变着民众的思维方式,使得英国人不自觉地形塑自我,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④ 可以说,这些永久性的展品体现了英国人能够控制世界的信心。

随着媒介的发展,剧院、布道、宣传册,报纸、杂志,以及在伦敦或地方博物馆、教堂的展品,都开始表现出民族性和种族自豪感。⑤ 1879 年创立的《英国男孩周报》,与姊妹刊物《英国女孩周报》一道,不断地用异国的殖民地前线那些离奇的故事来吸引年轻的读者们,两份杂志的发行量超过 50 万份。1900 年 10 月《大英帝国的男孩们》诞生了,旨在更加系统地用诸如“如何更强壮”、“帝国英雄”和“幼狮在哪里受训:澳大利亚和那里的学校”等文章来教化这些年轻的读者。⑥布尔战争期间,《每日邮报》的销售份数首先突破 100 万份,一位编辑被问到推动报纸销量的主要因素时说:“第一个答案就是‘战争’。战争不仅提供了新闻素材,也激发了人们看新闻的需求。人们对战争,以及所有与战争有关的事情深深着迷……以至于报纸必须在醒目的位置告知有‘重大战役’的新闻,这才能卖得好。”主编诺思克利夫的解释更简单:“英国人要一个英雄来热爱,也要一个敌人来憎恨。”⑦

体育比赛不仅仅是运动,也在无意中却加强了大英帝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诸如帝国板球大会等机构,为营造学者希利笔下或者张伯伦口中的所谓“帝国集体认同感”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英国板球队接连输给殖民地球队。1909 年,帝国板球协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主旨是统一运动规则。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史蒂夫·贝登堡旨在将球场上的团队精神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将帝国精神融入这项运动中,他说:“我们都是英国人,尽已本分并帮助邻居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要保持强大、团结,这样我们的整个建筑,也就是说我们的伟大帝国,将不用担心因墙上的砖块朽烂而垮塌……你们应该将‘国家第一、个人第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⑧

不难发现,英国社会许多机构和组织的存在价值、学校的教育目标以及一些社会准则,都依赖于帝国的存在,一些大众报刊、冒险故事、浪漫小说、

① C. C. Eldridge,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70—1975, Longman,1983, p.41.
② H. C. G. Matthew, *The Liberal Imperialists: The Ideas and Politics of a Post - Gladstonian elite*, p.161.
③ P. J. 马歇尔:《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樊新志、惠春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8—159 页。
④ 参见洪霞、谢小琴:《从精英掌控到大众文化空间》,《史学集刊》2012 年第 3 期。
⑤ Andrew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292.
⑥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 223 页。
⑦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 222 页。
⑧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 225 页。

体育比赛及歌曲,都是以帝国为主题的。① 这其中宗教的作用尤为突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基督教的普世福音是完全同一的概念。19世纪中期任的殖民大臣格雷甚至将英国人传播基督教福音与西方的文明看作是一种"伟大的特权"(the great privilege)。② 格雷的信念几乎反映了所有英国人的信念,1917年,英国学者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在他的《英格兰简史》中,把基督教看做文明的同义词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任何人想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教曾经是,现在也是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时候,、我们想说的到底什么,有一种粗略但简单的表述,就是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基督教'这一词汇的众多用法中,哪个才是最普遍的……长久以来普通大众之间的谈话中一直蕴涵着一种和含义,它意味着文化或是文明。"③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曾指出:"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无疑渴望一个统一的、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政府全都承认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那些无私的传教士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还来得强大。"④

除了这些无形层面,英国的文化霸权还体现在他们的原创性法律和传统上,也体现在王国政府、议会和法庭上。正如1859年英国人西德尼·贝尔所说:"大不列颠的权力……是完全建立在我们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素质上的。这些品质也是他们拥戴的政治机构所鼓励和提倡的。"⑤

英国议会作为反对独裁统治的民权保护者,象征着帝国内的自由,是英国民主制度的体现。因此,对专注于英国世界霸权和致力于保护帝国臣民的人来说,议会永远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部长、大臣和海外的官员对议会负责;而议会的议员要为帝国臣民的权利和利益负责,无论他们有无代表在议会之中。

而英国权威最强有力的象征符号就是它的君主,君主是本土与海外稳定、团结和秩序的象征,帝国和英联邦所有人都有义务向英王效忠。尽管维多利亚女王统而不治,但却成为民族文化和社会道德的象征,女王的塑像、主题广场、主题公园等遍布英国各个城市,其后期更加强了对庆典和公共仪式的重视,通过人为地不断灌输其象征意义、塑造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宣布英王是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⑥ 1876年,她还被加冕为印度女皇,甚至被称为其所有子民的"伟大的白人母亲"。君主形象得到了从迪斯累利到丘吉尔的历任英国首相的巧妙运用。1897年6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她登基60周年的庆典,庆祝英帝国的发展与成就,这标志着英帝国在声势上达到顶峰。对于这次庆典的意义及影响,当时的《每日写实报》曾给予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总结:"对于我们而言,考察六十年的统治和充斥于我们街头的帝国的缩影, 已经成为发自内心的满足的源泉了。……英国的力量源泉在于内部的社会稳定和殖民地的热切忠诚,有了这些,一个大陆上的强国甚至于一组大陆强国的联盟,都是微不足道的。"⑦

可以说,随着不列颠帝国的兴起及其影响的扩大,其思想和信仰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英国对殖民地的影响不是有意识的,而是自发的、无意识地向殖民地人渗透着英国式的习俗、知识和信仰,对殖民地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移居海外的英国商人盖起了带阳台的方砖瓦房,他们在里面喝茶,饭前要饮杜松子酒,然后女士们就都聚在一起休息,这成为殖民地人效仿的对象。

---

① See John M. Mackenzie, *Impe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Manchester University, 1986.

② C. H. 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1924, p. 166.

③ 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页。

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⑤ P. J. 马歇尔:《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第161页。

⑥ 参见大卫·卡纳迪恩:"仪式之背景: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年",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215页。

⑦ Denis Judd, *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1997, p. 132.

此外,苏格兰传教士向一代又一代的印度人和非洲人教授英国文学和科学,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们则培养他们定期诚实交纳各种政府税金的意识,而英国人建立的学校、英国人带来的体育比赛则培养了他们的纪律、合作和公平竞争等欧洲特质。① 肯尼亚当代诗人恩古吉曾经生动地描述道,肯尼亚的精英们“并不需要外出游历和居住国外以了解和模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他们不是已经从代表宗主国文化的殖民定居者那里学到了这一切吗? 培育于旧殖民体系之中,他们已经发展成熟至买办的顶点,将当地的欧洲人看做是绅士风度和贵妇人优雅气派的全部体现。随着阻碍阶级流动的种族隔阂被打破,欧洲绅士风度——上衣翻领上的玫瑰花芽和饰针、胸前口袋里的洁白方巾、燕尾服、高顶黑色大礼帽和金链怀表——不再只是梦想和希望了。”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帝国权威或行使权力的权利,最终取决于一种心态——统治者的自信和被统治者对征服的接受,双方的共识和赞同形成了英帝国的话语霸权。这在殖民地可以找到太多回应,印度教育大纲修订者和倡导者查尔斯·特里威安说:“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是要唤醒殖民地属民对于他们先天的性格的记忆……这种性格……由于东方社会的封建性质已经变得很败坏。在这种基于早期传教士的叙述的普遍化描写中,英国政府被重新塑造成一个理想的共和国:一个印度人一定会自然地追求的自觉的自我形象的体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获得了一个柏拉图卫士的象征性的地位。”③在与英国同宗同源、而且几乎是将英国社会异地移植的白人殖民地,英国更是听到了不少赞同的声音和积极的支持。1872 年,当英国诗人丁尼生用诗句驳斥有人所持的加拿大应考虑独立的论调时,加拿大总督杜菲林爵士代表加拿大函谢这位桂冠诗人,因为他有力地斥责“加诸某些人,他们设法瓦解帝国并出卖和使人厌恶这个最富强的殖民地居民。”他又补充道:“你高贵的词句已经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击出了‘共鸣的火花’。”④1909 年,加拿大总理洛里埃曾经说过:“如果英国的霸权……受到挑战的一天到来时,其所有的女儿应从陆上、海上筑成堡垒来捍卫她不受攻击,这是她们的责任。”⑤

尽管英国与殖民地的冲突贯穿英帝国之始终,但是英国人构建的文化霸权,的确是受到了来自母国和殖民地双方的“积极的赞同”,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支撑英帝国的重要支柱。

三、帝国体系内的互动和霸权的颠覆

英帝国话语霸权的建构过程,是个英国和殖民地相互塑造、双向建构、共同生长的过程,是一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和流动。一方面,是英国由内而外地建立起他们的文化优势,另一方面殖民地对于英国文化渗透并非只是单纯的接受,而是在英国文化控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民族性。对英国来说,话语霸权的建构是英帝国体系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殖民地而言,是对帝国话语霸权的认识、摆脱进而改造的过程。

要理解这一双向互动性过程,首先来看看要 19 世纪中期英国形成的“自由帝国”体系,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福音教派及人道主义运动的传播,自由帝国的一大特征便是“关注”土著地区的利益,并标榜要为殖民地建立一个“好的政府”。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提出了著名的“殖民地托管”理论,认为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是共同的称谓,血肉之情,相似的特权,平等贸易保护制度,“这些纽带,尽管轻如空气,但却坚如钢铁”⑥。在具体做法上,英国创立了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政府制度,给与白人移民殖民地以内政自主权,并将英国的议会制度推广到白人殖民地,在白人殖民地建立“得到多数人信任的”、“行政机构

---

① P. J. 马歇尔:《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第 177 页。
② E·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第 272 页。
③ 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 152 页。
④ 约. 阿. 兰.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 1885—1945》,姚曾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196 页。
⑤ Robert J. Bondy, *Canada: Windows on the World*, Ontario,1983, p.9.
⑥ George Bennett ed., *The Concept of Empire, Burke to Attlee*, 1774—1947, London, 1967, p.41.

对议会负责的"责任政府制度①,其大多数立法不再从属于英国议会;同时,英国在非白人殖民地注重发展当地福利,向土著地区传播英国式的文化、宗教、法律等。可以说,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统治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理论通过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把正式和非正式地统治非西方人合法化了。② 这种帝国统治体系的建构,不可避免地把一些西方模式、西方法律、西方教育、西方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引进到殖民地社会的各个领域,促使殖民地社会的演进和变异。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对英国来说是从内而外地推进文化霸权的过程中,英国为殖民地知识和观念上的变革准备了条件,而殖民地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自外而内地逐步构建自身的民族性。

英国给予白人移民地区的自治制度,是其民族国家的基础,也促成了白人移民地区民族性的形成。以加拿大为例,正是在自治制度的保护下,加拿大得以迅速发展,从而勾画出现代加拿大的地理轮廓,又具备了独立国家的全套机构和大部分功能。而且,正是由于自治原则本身的鼓励,加拿大在与母国的冲突中往往会自动作出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选择,奉行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加拿大第一"的原则。③

作为自我选择的结果,加拿大在帝国的框架里形成自己的民族性。首先是不同于英国社会的平等、民主。她从最初的二元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即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风俗的平等;社会各阶层也相对民主、平等,正如一战初期一名参战的加拿大士兵指出的:"在英国……存在着非常分明的阶级差别、阶级障碍——我还以为这些东西早就没有了呢 ,而且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是件非常好的事。"④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社会,艰苦严酷的生存环境往往把各国的移民的社会差别淹没在生存斗争之中,而移民成分主要是社会的中下层,因此减弱了社会差别。其次是简单、缺少艺术和较高的文化。加拿大仅有少数城市拥有高等教育的团体,没有出现过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连加拿大人自己都慨叹道:"加拿大的船只,满载着加拿大工业品,几乎漂流在所有海域。但有多少外国人知道加拿大人的思想和学术成就呢?"⑤作为殖民地,加拿大的宗教、文学、科技都来自于外部,有原创力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移民大多来自母国的中下层,很少对形而上学的东西感兴趣。加拿大民族性的形成,表明它与母国已形成差异,具备了"拥有进行独立国家事业的潜力"。⑥ 其他白人移民地区也是如此,虽然是移植和照搬英国文化,但均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再造了自己的民族性。

印度民族性的形成,也与英帝国的霸权体系息息相关。印度学者帕尔塔·查特吉在《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一书中,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来论述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分离期,指的是印度民族主义者着重关注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的优劣上,这是英印两种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印度上层精英认为要实现印度民族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结合,但是只是做了理论设想,无法有效动员下层民众,故而是民族主义的初期。印度人面对英国的话语霸权,基本上还处在被动性的思索、探寻中。第二个阶段是策略期,代表人物是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甘地虽然吸收借鉴了托尔斯泰、罗斯金等人的思想,但其核心观念是激活印度传统社会的资源,建构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从英印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来说,甘地主义是对英国话语霸权的有意识拒斥,甚至有摆脱英国文化所代表的现代性之意图。不过,甘地的行动卓有成效:终结了国大党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的分裂状态,完成了对底层群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动员,改变了之前印度民族意识停留在精

---

① Lord Elton, *Imperial Commonwealth*, London, 1945, p.292.

② 尼尔·弗格森:《文明》,第 127 页。

③ J. M. S. Careless, *Canada: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Toronto,1959, p.389.

④ R. D. Francis ed. ,*Reading in Canadian History Post – Confederation*, Holt, 1986,P.154.

⑤ Carl F. Klinck ed.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Vol. I,Toronto, 1976, p.217.

⑥ Judith Brown and Roger Loui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V, Oxford, 1999,p.57.

英层面的状况。因此,这一阶段是印度民族性试图和英国文化特性分道扬镳的转折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完成期,也就是尼赫鲁及其领导下的国大党时期。由于甘地为国大党争取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尼赫鲁将甘地主义和他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构建现代民族进而掌握现代国家的建国纲领。甘地摆脱现代性的道德理想主义,最终被整合进尼赫鲁依靠国家、代表民族、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正义的理性化过程之中。在这一阶段,印度民族性和英国文化特性之间找到了契合点,英国人带来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之后印度发展的起点。①

而在以非洲为代表的其他殖民地中,也存在着英国文化和殖民地之间的互动关系。当代英国学者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表明: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是欧洲发明传统(教会的、教育的、军事的、共和国的、君主制的)的极大繁荣时期,同时也是欧洲人大量涌入非洲的时代。② 鉴于英国和非洲在政治、社会、法律制度之间能确立的联系非常少,所以英国人着手为非洲人发明传统,尊重那些在非洲历史上是“传统”的东西,通过有意识地整理和传播这些传统,将那些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转变成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又不可避免地为这些“传统”带来英国式的色彩。可以说,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了“现代”行为模式。虽然非洲社会的发明性传统——无论其是由欧洲人发明还是由非洲人作为回应而自己发明的——都歪曲了过去的历史,但是“传统”本身已成为确凿无疑的现实,而且正是由于这些“传统”与帝国发展进程之间的矛盾,大量殖民冲突得以显现。③

近期,英国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产生广泛影响的《帝国》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道:“这个帝国的存在究竟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还是不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④的确,大英帝国在其漫长的统治时间中,是如何取得霸权地位的,又是如何形塑现代世界的,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如何评价英帝国的功过是非,也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要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主义是一部制造出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抽象的机器,如前所说,这种话语霸权是以绝对性、原生性为特征的,换言之,一旦殖民地同一性被确认为是人工产物,是被发明出来的,那么反殖民政治就具有可能性了。对帝国话语霸权从赞同到认知、继而摆脱,是个英帝国和殖民地复杂的、长期的互动性过程。其结果,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与帝国的互动中逐渐成熟的殖民地开始了大规模的非殖民化进程,从而以一种真正的革命性、否定性的姿态挑战了帝国的同一性,并进而彻底颠覆帝国的话语霸权。

The Rise and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s Discourse Hegemony

Hong Xia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worldwide hegemony acquir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has been supported by the discourse hegemony constructed during its expansion. The discourse hegemony consists of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s legitimacy. The discourse hegemony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the ideology of both Britain and its colonies in an invisible way, obtaining active consent from both sid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pire's discourse power went side by side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Britain and all its colonies, which created a suspense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Empire's influence.

Key words: British Empire, discourse hegemony, colony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参见帕尔塔·查吉特:《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三、四、五章,第 67—233 页。

② 特伦斯·兰杰:“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第 270 页。

③ 特伦斯·兰杰:“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第 271—272 页。

④ 尼尔·弗格森:《帝国》,前言,第 VII 页。